

中国文化的整体反思

——试析贾平凹《高老庄》

李小红

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贾平凹敏感地意识到这种转型所带来的人的精神巨大震动。在其创作的长篇小说《高老庄》中,他对整个中国文化进行了整体的反思。

关键词:贾平凹 高老庄 中国文化 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转移,包括贾平凹在内的诸多作家认识到,经济的转型,决不仅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变化,而是一场包括政治、文化、道德等在内的全社会的变革,是从传统的乡村文明向现代工业科技文明过渡的真正开始。中国是一个以乡村为主体的农业大国,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古老而深厚的传统乡土文化。因而,从乡村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渡,是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这两种文明不断对峙、冲突的文明苦旅。两种文明冲突的加剧,导致物质与精神、感情与理性、金钱与良知、灵与肉的对立愈加明显。价值多元化与文化选择的艰难,使许多作家迷惘、困惑。“既然我选择了作家的职业,而且还将继续工作下去,讲述商州的故事或者城市的故事,要对中国的问题作深入的理解,须得从世界的角度来审视和重铸我们的传统,又须得藉传统的伸展或转换,来确定自身的价值。”这是1994年4月贾平凹在《〈商州:说不尽的故事〉序》里的一段文字,贾平凹借此将自己的文化认识和盘托出。由此,贾平凹经由商州文化的反思进入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反思,这一反思的结果就是长篇小说《高老庄》的问世。

《高老庄》的基本线索是在高老庄长大、在省城上学,然后当了大学教授的子路,携再婚妻子西夏回到高老庄祭奠去世三年的父亲,在高老庄的一段平凡生活,以及和高老庄人的一些交往关系。作品的叙述看起来很平淡,甚至不无琐碎,整部作品没有什么完整的事件,也没有连贯的故事,通篇家长里短,鸡零狗碎,子路和西夏的脚步到哪里,小说就跟进到哪里。正如有评论家所形容的那样,作者好像只是个藏起来的摄像师,决不干预高老庄的生活秩序,只是忠实地记录而已。但是,在这种平淡的叙述与忠实的记录背后,隐含的是作者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反思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对乡村文化的弊端予以理性的审视;执着为正在受着现代文明入侵的乡村文化找寻出路。

1、理性审视乡村文化的弊端

在《高老庄》中,贾平凹安排了主人公的“回乡”之旅。这不仅是一次身体上的回乡,更是一次灵魂上的回乡。贾平凹为男主人公起了一个别有深意的名字——子路,这本是孔门第一代弟子的名字,子路在孔门弟子中是颇有侠义气而又经世有方的形象,但在贾平凹的笔下,却成了一个身体矮小、在大学里教授古代汉语的彻头彻尾的现代儒生。他同样也是一个在乡村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因此在情感上对古老的乡村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回到高老庄的子路不再坚持睡前的洗涤,甚至说还想把刷牙的瞎毛病改了。吃完饭伸了舌头舔碗,不分时地无所顾忌地放屁,很不文明地蹲在尿桶上拉屎,甚至还津津乐道小时候怎么在野地里排便用土块或石片刮屁股……这一切都表明子路对于乡村文化具有的极大的亲和感和认同力。但是,随着他在高老庄居住时间的增加,他发现此“高老庄”已非他记忆中的“高老庄”。传统乡土文化浸淫下的高老庄人性的丑陋令他倍感矛盾、困惑:赌博成风,开地下妓院,殴打白云寨卖木头的村民,哄抢太阳坡的树木,洗劫王文龙的地板厂,侮辱村里的女强人苏红等等。在书写高老庄人人性的扭曲与变异时,作家还刻意描写他们生活的“肮脏”与丑陋。他曾说:“《高老庄》里的一些乡俗我之所以写到那些生活习惯的‘脏’处,意在哀高老庄的不幸,这正是他们的文化僵死,人种退化的环境。”^[1]在这样的环境下,此时的高老庄与高老庄人已不再淳朴、善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仁、义、信、恕道被他们抛在脑后,记录他们祖先追求仁义、恕道的碑文弃之若蔽履——高老庄人正在割断自己与先人的传统之间的联系,先人血液里所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的美好道德与人性在他们身上正消失殆尽。经历了都市文化、精英文化熏染的子路从乡村走向都市又回到乡村,以“归来者”的眼光重新审视故土的一切时,他感到了传统乡土文化、乡村生存环境使高老庄人乃至整个人类生命的蜕变与弱化。于是,他本来准备与西夏在高老庄怀孕的计划随着他的性功能衰退和对高老庄的恐惧而告吹。小说结束时,作为儒家思想化身的子路在经历了精神还乡的种种洗礼后急于回到寓居的都市,他撕掉了记载高老庄方言土语的笔记本,并跪在父亲坟前痛哭流涕,决定再也不回高老庄了,作家通过子路的

视觉,以他精神还乡的失败与精神家园、传统文化的决裂,表现出对乡村古老传统文化的弊端理性而深刻地审视。

2、执着找寻乡村文化的出路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子路一回到家乡,现代文明就以无孔不入的力量呈现在他面前,此时的高老庄已不再是80年代的商州,记忆中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已彻底成为历史。村庄里办起了地板厂和纸箱厂,蔡老黑的葡萄园成为酒厂原料的供应地,村民们已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放下锄头进了村办工厂。现代文明给高老庄人带来了逐渐丰足的物质生活,也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但与此同时,高老庄更有着土匪一样的蔡老黑,有着被骂作妓女的苏红,有躺在地上的醉汉,有吵不完的架,有臭气熏天的尿窑子,有苍蝇乱飞的饭店。此外,曾经是贞节牌坊林立的高老庄如今妇女卖淫已属正常,昔日不为斗米折腰的高老庄人如今为蝇头小利也能哄抢集体的林木。由此出发,作者对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夹击中的乡村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在贾平凹看来,现代文明在为高老庄创造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真正的危机:它不仅在毁掉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也在逐渐毁灭人们的精神追求,甚至导致人类自身走向灭亡。

贾平凹早在1984年《腊月·正月》的后记里就说过,“汉代的文化是最有力量和气度的,而比雍容富贵的盛唐文化更引起人的推崇和向往”,而“陕西人已没有了秦汉强盛之气”,“古人崇扬志在千里的良骏,今人看重负重慢行的耕牛”,于是“性格由开放型归于封闭型”。对于这种封闭型的乡村文化,贾平凹急于为它找寻一条出路。在《高老庄》中,就是女性人物西夏的出现。

西夏是以妻子、媳妇、继母的角色进入高老庄人视野的。西夏原本是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据史料记载,党项族人威猛雄壮,能骑善射,带有鲜明的游牧文明的特征。从贾平凹对女主人公命名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想把一种新的文化基因注入古老的“高老庄”。这一点,小说中也明确地表示,如子路初见西夏也是在“为了逃避焦虑”的时候,被她“唐大宛马”一样的“形体美,人格美,以及神秘”所吸引、征服。子路“太矮小”了,“没有什么就希望什么”,于是在古汉语课上他讲起了大唐壁画,“激赏那个时代的伟大:马是西域的大宛马,人也不是纯汉族,那画中的女子的形体容貌,服饰和发髻,并不是要以胖为美,而是展示了一种崇尚力量的世风。”西夏是一位在现代文明的濡染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却有一个与传统文化、乡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职业——文物考证。这使得她很快融入了高老庄的文化圈,在日常生活中,她以平等的一员参与高老庄人的活动。对于子路的前妻,她以礼相待、和平相处;对于子路与其前妻的孩子,她也呵护

备至。她学习当地方言,了解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介入、阻止纠纷与冲突,如倾听高老庄婆媳们诉说生活的艰辛,帮助蔡老黑拯救濒于破产的葡萄园,参加修复白塔的劳动,解调蔡老黑与苏红的矛盾,甚至热情地将城里人引到乡下来投资开发土地。她从高老庄人用来砌猪栏、垫茅厕的残碑断砖中,发现了高老庄辉煌的历史及高老庄人过去崇高的传统美德:崇义、尚武、知礼、好德,为保全自己文化血缘和种族血缘纯洁而不畏艰难地斗争。她明达、平和、宽容、聪慧,有教养,富于同情心——在她身上,现代文明的优秀成分与传统乡土文化的美德已融于一体。我们看到一种开放的胸襟,这种开放胸襟其实就是贾平凹建构乡村文化的理想。小说的结尾,当子路即将离去的时候,西夏决定留下来。西夏的留表明,她需要将自己身上优秀的现代文明因子植入古老的乡村文化和乡村社会。这也是作者所作出的一种最理想的文化选择——把现代文明中的优秀成分融入传统乡土文化中,以使乡土文化与乡土社会获得旺盛向上、永久不衰的生命力。

在小说对高老庄的文化进行反思并试图为其找寻出路的同时,作家实际上也是在为整个中国找寻出路。高老庄不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缩影?贾平凹也曾说过:“现在我写《高老庄》,取材仍是来自于商州和西安,但我绝不是写的商州和西安,我从来也没承认过我写的就是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商州和西安。”^[1]“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2]著名评论家肖云儒这样评价《高老庄》:“小说有一个大的生命意象。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一种文化,也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沉滞的漫长的岁月会使它衰老,需要不断引进新的因子,在交汇融通中激活。《高老庄》写的就是这种古老种族和古老文化的生命体,在曾经有过的几度繁荣发展之后,开始衰微,而现在又开始了新的多维交汇,出现了振兴的急切探索,显示了文化原生体被再度激活的征候。”^[4]在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以后,贾平凹同样冷峻地审视现实乡村生活,传达出了自己对于乡村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独特感受和认识。

注释:

[1]贾平凹.写作是我的生命[N].文学报,1998年8月6日.

[2]贾平凹.高老庄[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P376.

[3]贾平凹.高老庄[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P376.

[4]肖云儒.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J].当代作家评论,1999(2).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宋玉秀